

輿論與導向

——「雙百方針」五十周年

● 章立凡

【輿】眾人的

【輿論】群眾的言論

【輿情】群眾的意見和態度

【宣傳】對群眾說明講解，使群眾相信並跟着行動

摘引自《現代漢語詞典》
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4)

宣傳工作要「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」這句話，在媒體上出現大約有十五六年了。領導習慣使用，群眾也耳熟能詳，但耳熟是否「能詳」，至少我不太清楚。最近出於研究毛澤東五十年前所倡「雙百方針」的需要，翻了一下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查到了以上的詞條。

輿論既然是「群眾的言論」，就不會是「一家之言」，需要的首先是傾聽。輿論具有多樣性，可以有正確的，也可以有不完全正確的，甚至是錯誤的。輿論往往不全是受用受聽的話，所以才有「忠言逆耳」之說。如欲將輿論變得適合某種需要，才會以「導向」來加以規範。但被「導向」規範了的「輿論」，是否具有可信度和實際意義，則是一個須要探討的問題。

毛澤東曾說：

我們在人民內部，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，這就是批評的自由，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，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

神論(即唯物論)的自由。一個社會，無論何時，總有先進和落後兩種人們、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着和鬥爭着，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後的意見，要想使「輿論一律」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應該的。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，才能使社會前進。……我們的輿論，是一律，又是不一律。在人民內部，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、刊物、講壇等等去競賽，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，克服落後的思想 and 制度。一種矛盾克服了，又會產生新矛盾，又是這樣去競賽。這樣，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。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。克服了矛盾，暫時歸於一律了；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，又不一律，又須要克服。(毛澤東：〈駁「輿論一律」〉，載《毛澤東選集》，第五卷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7〕，頁157-59。)

毛澤東這段話，是1955年在為批判「胡風反革命集團」而寫的一篇文章中出現的，他主張「不許反革命份子發表反革命意見」，同時主張「在人民內部，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」。

1956年4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，在討論毛澤東〈論十大關係〉的報告時，陸定一、陳伯達等建議在科學和文藝事業上「百花齊

放，百家爭鳴」，立即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：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，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。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，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。5月2日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「雙百方針」。

1957年2月27日，毛澤東又在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〉的講話中指出「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，耳邊很須要聽到不同的聲音」；並重申「雙百方針」，強調：

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，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。利用行政力量，強制推行一種風格，一種學派，禁止另一種風格，另一種學派，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。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，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，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。（毛澤東：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〉，載《毛澤東選集》，第五卷，頁388。）

應該說，毛澤東關於輿論「一律又不一律」、使社會不斷前進的矛盾對立統一法則，是很高明的哲理，而「雙百方針」則是其在學術文化領域的實踐，可惜他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闡釋和實踐的。歷史已經證明，將胡風等人打成「反革命集團」是個錯誤，而「雙百方針」在提出僅僅一年之後，就被1957年的「反右」運動所中斷，令毛澤東耳邊「不同的聲音」愈來愈少，歷經「大躍進」和「廬山會議」，「揣摩學」盛行，人人講假話，學術和文化日趨僵化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了「一言堂」，最終導致了「文化大革命」那樣的歷史大倒退。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：「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。」（鄧小平：〈對起草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的意見〉，載《鄧小平文

選》，第二卷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4〕，頁298。）

毛澤東逝世後，通過對真理標準的討論和對「兩個凡是」批判，我國的言論尺度走向寬鬆，特別是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，對「雙百方針」的貫徹是比較好的，出現了毛澤東所主張的「又有集中又有民主，又有紀律又有自由，又有統一意志、又有個人心情舒暢、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」。其間雖有「清除精神污染」之類的寒流，但為時短暫，「寬容」仍是社會主流。

後來出現了「輿論導向」的提法，「導向」是一種技術思維，具有人為的規範意義。通過定向的技術操作，過濾了相當比例的信息，使發表的言論適合預定的尺度和方向，比較便於管理，領導的耳根也因此清淨了許多。但其中的弊端在於：輿論的監督功能弱化了，不同的聲音聽不到了，一些社會矛盾被掩蓋了，反過來又會影響領導決策的科學性，降低執政能力。

社會是個有生命力的活體，預定的「導向」卻難免有偏頗，不見得一貫正確：「大躍進」時的豪言壯語這裏就不提了，在整個「文革」期間「階級鬥爭為綱」都是一種「導向」，最終被證明不是「一句頂一萬句」的真理。如果服從「兩個凡是」的錯誤導向，也不會有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」的改革開放。

那麼，堅持「正確的導向」不就萬事大吉了嗎？也不見得。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」曾是極有號召力的主張，但貧富差距拉大引起的社會失衡，使公眾重新懷念共和國成立時「共同富裕」的社會理想；前些年「教育產業化」是社會的主流話語，如今則是連教育部都不敢認領的「無頭案」；「拉動內需」的口號在當時看來也很正確，但無數「政績工程」和公款消費也乘機搭了便車，給經濟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，於是又提出建設「節約型社會」的國策……

千萬別將所有的工作失誤，都推給「摸着石頭過河」（這句話本身是沒有導向的「導向」）；我們早已慣見以正確的名義犯錯誤，以維護正確的名義堅持錯誤，以難免的名義粉飾錯誤，以糾錯的名義標榜自己「一貫正確」……

陳雲提倡「不唯上，不唯書，只唯實」，但「導向」往往被理解為「領導指出的方向」，如果要群眾按「導向」說話，小領導按「導向」上報，大領導按「導向」理解，就難免陷入一種相互欺騙的戲劇性怪圈，令「大躍進」年代的「假大空」死灰復燃，破壞執政黨「實事求是」傳統。

舉例來說，媒體宣傳「發展才是硬道理」，本來無可厚非，但生存同樣也是「硬道理」。多年來，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，是發展權與生存權之間的尖銳矛盾，雖已冰凍三尺，以往卻不在「輿論導向」之內；直到一位農婦斗膽向溫家寶總理說了真話，才引起中央重視，採取措施着手解決。這類民生問題也因而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，並進一步擴展到整個「三農」領域。又如「非典」初起時，從衛生部到地方當局都封鎖消息，大唱太平歌，後來有輿論「出口轉內銷」，形成國際壓力，才使這一重大疫情曝光並得以控制，並使相關制度進一步健全……

以上事例都說明：事先規範化的「輿論」，難免會失去群眾言論的本義，而趨同於宣傳。有「導向」的「輿論」不一定是真輿論，真正的輿論往往不受「導向」左右，卻並非沒有可能影響「導向」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，有關政策的調整和糾正，往往都有輿論監督的介入，而不是「輿論導向」的產物。

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是封建時代的執政經驗，但也不無可借鑑之處。毛澤東更在1945年就宣布找到了跳出「歷史周期律」的方法：「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，政府才

不敢鬆懈。只有人人起來負責，才不會人亡政息。」今天的民眾要盡公民的責任，就應該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，暢所欲言地講真話。

要跳出歷史的「周期律」，就須要接受輿論監督，而不是監督輿論。在通訊、互聯網發達的信息時代，要想封住所有「出氣孔」，如同鯨治水，近於無效勞動，後果還可能適得其反。聽說中宣部成立了一個輿情局，倘若它能夠博採輿情作為執政黨決策的參考，對於轉變機構職能來說，倒是一個極好的立意，執政黨將會因此獲益。

執政黨要貫徹自己的大政方針，利用媒體「對群眾說明講解，使群眾相信並跟着行動」，是完全必要的，但這屬於「宣傳導向」。如果出於「穩定壓倒一切」的慣性，按照「宣傳導向」克隆出「輿論導向」，就有可能因防民之口而閉塞視聽，甚至連自己都被「穩定」壓倒。

本文所說的只是社會文化的一般常識：宣傳就是宣傳，輿論就是輿論，媒體的功用可以是耳目喉舌，但輿論絕對不應被定位於工具。將「輿論導向」改稱「宣傳導向」，庶可實至名歸。

在「雙百方針」出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，將輿論工具化的思維早已過時。違反了自己正確的東西，就難免重犯歷史錯誤，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繁榮和社會的民主法制建設。執政黨的宣傳與社會的輿論，可以互動但不可互代，可以並行不悖而又相得益彰。宣傳與輿論的互動與制衡，才是促進社會和諧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章立凡 1950年生，中國現代文化學會理事，近代史學者。主要研究領域為北洋軍閥史、中國黨派史、中國現代化問題及知識份子問題等。